

DOI:10.13718/j.cnki.xdsk.2025.03.023

历史研究

引用格式:王刚,杨宇翔.为何调查与如何调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的幕后策划(1907—1916)[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302-315.

为何调查与如何调查: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的 幕后策划(1907—1916)

王刚,杨宇翔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以东亚同文会与日本外务省往来文书为主要资料,系统考察1907—1916年东亚同文会高层对“大旅行调查”的幕后决策,剖析调查活动的决策机制、主要意图和实施过程。研究发现:这10年的调查分为三个三年周期实施。各周期的调查思路都贯彻了对华“实业诱导”的主要用意,故调查题目和人员配置等一直保持稳定,调查线路则前后衔接、层层递进,最终目标是覆盖中国所有都市。除“实业诱导”外,“大旅行”调查从一开始就兼有政治、军事用意。辛亥革命后,策划者对华野心不断膨胀,政治、军事类调查日益细密,并紧跟时局热点。这一情形反映出“大旅行调查”的侵略本性。

关键词: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日本对华调查;根津一

中图分类号: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5)03-0302-14

近代以来,日本官方和民间对中国实施过名目繁多的调查活动。其中,由东亚同文书院实施的“大旅行调查”持续了近40年(1907—1945),累计调查线路达600多条,迄今仍保持着日本人海外调查的最大规模纪录^[1]。日方为什么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实施“大旅行调查”?其居心究竟何在?为实现这些居心,每年的“大旅行调查”如何安排调查路线、人员配置、经费预算等?这些都是研究近代日本对华调查乃至近代中日关系无法绕开的课题。目前,学界关于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呈现出“似多实少”的特征:成果总数虽有近百种,但概述性、介绍性的论文占了很大比例,研究性成果十分有限。其中,深入探讨过“大旅行”调查动机者,以日本学者薄井由^[2]和旅日中国学者翟新^[3]为代表。前者否认“大旅行”有侦查和侵略意图,强调书院年轻人对于大陆历史、地理的憧憬以及挑战艰难的冒险精神^{[2]236}。后者指出“大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助推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一开始就有邪恶的动机^[3]。这一研究深刻揭示了“大旅行”的侵华属性^{[3-4]4},相比薄井的研究更有理有据,但研究时段侧重于1907年“大旅行”开端时期,对之后调查动机的演变情况缺少梳理,论证力度尚显不足。

作者简介:王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地区调查活动研究”(18BZS106),项目负责人:王刚;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日本参谋本部对华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SWU220927),项目负责人:王刚。

至于每年的“大旅行”调查如何展开,日本的藤田佳久和国内的李彬等做过一些研究^[5],但都是从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视角入手,对书院母体东亚同文会关注不够^[6-7],未能呈现调查方法的“顶层设计”。另外,在资料利用上,都以东亚同文会自编的《中国省别全志》或霞山会(东亚同文会后身)所编《东亚同文会史》等出版物为主,对档案材料使用不多。事实上,这类资料体量不小,对揭示“大旅行调查”的内情似价值更高。比如,围绕某一时期或每年“大旅行”的策划,东亚同文会和外务省之间有大量往来文书,它们能反映出每个周期或每年大旅行调查从酝酿到实施的过程。鉴于此,本文以这类文书为主要资料,考察“大旅行调查”开端时期及其后10年(1907—1916)内东亚同文会高层的幕后谋划,以期对揭示“大旅行”的调查动机和调查方法稍有补阙。

一、对华实业诱导与“内地大旅行”计划的提出

东亚同文书院及其母体东亚同文会,都是近代日本“兴亚”思潮的产物。19世纪80年代,俄国宣布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加快了在亚洲的扩张步伐。一些所谓“东亚先觉志士”担心日本被欧洲列强吞并,产生了联合中国、朝鲜遏制西方扩张的观念。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荒尾精和根津一。荒尾精、根津一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前后级同学,又都供职过参谋本部,他们的“兴亚”观念受军部的影响,鼓吹日本占领和统治中国、朝鲜,合三国之力与西方抗衡。1886年,荒尾精抱着这种“雄图大略”来到中国,以“汉口乐善堂”为中心,笼络了一批“兴亚志士”,企图策动起义,推翻清朝。但两三年后,“汉口乐善堂”便因经费无着而解散。其间,荒尾精的“兴亚”观念发生了变化,认识到对抗西方需经济实力作支撑,当务之急不是推翻清朝,而是振兴中日贸易,与西方展开“商权竞争”。经多方奔走,荒尾精1890年在上海设立“贸易诱导商会”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不遗余力推动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其间,根津一作为荒尾精最重要的助手,实际主持“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日常工作。1892年,他将汉口乐善堂的对华调查资料编成《清国通商综览》,在情报活动服务于“贸易诱导”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丰富经验和强烈执念^[8]。

1893年,“日清贸易研究所”同样因经费不足而关闭。紧接着,甲午战争爆发,荒尾精周围的“兴亚志士”星散四处,他本人染上鼠疫客死中国台湾。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以日本公爵近卫笃磨为中心,“兴亚”志士重新聚拢起来,于1898年成立东亚同文会。原“汉口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不少成员,成为该会的重要干部。其中,根津一担任该会干事长达14年(1900—1914),担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达23年(1900—1923),长期主导着该会的对华方针和书院的办学思想。原本在立会之初,会内决策由会长近卫笃磨和干事长佐藤正主导,他们在阻止“西力东渐”问题上与荒尾精一脉相承,但对“商战”思路不甚热心。佐藤正1899年指出:通过政治、商业交往固然也可以实现“中日亲善”,但两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不会总是一致,难免有隔阂和冲突。而秉承“师教”是两国共同的传统,因此教育是实现“亲善”的更好方法^[9]。于是,该时期东亚同文会以教育为主要事业,与时局保持一定距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该会创办了“南京同文书院”。不过,佐藤正在1900年辞去干事长和“南京同文书院”院长之职,根津一继任这些职务。之后,根津一抛弃了佐藤正起草的书院章程,另起炉灶。新章程移植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办学方针,以推动对华经济扩张为主要目的。课程设置以商务类为主,师资配置大量任用“研究所”时期的师生(如白岩龙平、土井伊八、宗方小太郎等)。同时,新章程重视“研究所”时期的“现地调查”,将“实地修学旅行”作为学生毕业的必须条件^[10]。1901年,“南京同文书院”迁往上海,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第二年8月,根津一便组织第一期学生往山东等地做“修学旅行”,这是该院学生“旅行调查”的开端^[11]⁴⁷。此后,每年都要实施。“旅行调查”的题目由书院教师根岸佑等人精心设计。其中,为“商务科”学生设计的题目以商业、贸易为主,为政治科学生设计的题目

以中国政局热点为主^[12]。同时,像当年编辑《清国通商综览》一样,书院还重视调查资料的转化。在1903年12月东亚同文会会员大会上,根津一报告:书院学生“修学旅行之际”,对“中国各地经济事情做实地的调查研究”,在“商业习惯、金融、交通运输、度量衡等相关问题”上均有“精致恳切”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可为日本实业家提供“大参考”,书院正在着手将它们编辑出版^[13]。第二年,以本期学生的调查报告书为主要素材,东亚同文会出版《中国商业习惯和金融事情》一书,将它特别寄赠“各府县厅及全国商业会议所”^[14]。至此,在同文书院层面,根津一已复活了荒尾精的“贸易诱导”野心。书院的“旅行调查”作为诱导、服务日本实业界对华扩张的重要手段,已小有成绩。

不过,根津一野心很大。其时正值中国“清末新政”,列强以此为契机,扩大对华投资,争相开发“中国富源”。在这轮争夺中,西方处于上风,日本无法抗衡。根津一对此忧心忡忡,企图举东亚同文会全会之力,实施“实业诱导”计划。在近卫笃磨主政时代,该计划未得到认可。1904年,近卫笃磨死去,根津一在会内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当年12月,他在会员大会上首次公开该计划,宣称:

回顾过去,本会一直主要致力于教育事业。然而展望未来发展趋势,我们认为有必要让日本实业家们积极拓展中国实业领域。因此,本会将进一步扩展现有事业,除了教育之外,还要让实业家们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并引导他们取得实际成果。^[15]

新任会长青木周藏明确表态支持,紧接着演说道:

现在清国举行新政……我们不能满足于名誉上的“开导者”,还要趁此机会谋划我国商业的扩张以及其他“诸般事业”。近年来,我国人对清国的关注越来越多,商业和其他专业领域也逐年兴盛,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然而,仔细审视其内容并考察其结果时,我们会发现其发展方式极其幼稚,与英、美、德等国对清事业相比,差距甚大。我国对清事业之所以如此不振,固然是由于从业者实力不足所致,但也有其他原因。大多数同胞对清国的风土人情和消费货物的种类性质知之甚少。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些人了解彼国的物质和嗜好情况,并对我国实业者进行良好的引导和支持,那么必然会看到显著的进步和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列国竞争。

本会过去一直以教育事业为主,但如今时势已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实业进行引导和支持。

可见,两人都主张集全会之力引导实业界对华扩张。在他们的鼓吹下,“实业诱导”计划在会内顺利通过。从此,东亚同文会的对华经营,很多都贯彻了“实业诱导”用意,之前已小有成绩的东亚同文书院更是如此。1905—1906年,书院又开辟了更多“修学旅行”线路,进一步调查中国国情^{[11]47-48}。调查资料很快转化为各种出版物,供日本实业界利用。其中,1906年开始出版的《清国商业总览》和《中国经济全书》两本巨著,集之前各期“修学旅行”调查报告之大成,篇幅均在2000页以上(后者达到12000页),被日本社会誉为“中国经济的大百科全书”,为日本实业界在华开疆拓土提供了重要参考^{[2]232}。不过,这些“成绩”填不满根津一的野心。相反,基于日俄战争后的局势,他认为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步伐太慢,需要加大“诱导”。原因之一是这场战争中,日本投入巨资而未获得赔款,国内财政极为困难,取偿方式是“清、韩二国的开发”^[16]。其次,战争之后,各国在华势力均衡,未来10到15年内不会以军事对抗为主,而会以经济利权争夺为主^{[17]199}。第三,战后清朝改革加快,社会进步明显,这对中西贸易有利而对中日贸易不利。过去60多年中,欧美各国对华投资巨大,但除了三四个通商口岸之外,其余地方收益不大。究其原因,是欧美人在华通商,无法驾驭中国各地的“异风殊俗”。但随着中国着手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其商业组织和习惯越来越与西方一致。这样,西方人将来在华通商会变得容易,必然加倍弥补过去几十

年的损失。届时,日本对华贸易将面临与西方的激烈竞争。要想胜出,必须要利用好未来 10 年的时间,先于西方人做各种准备。重中之重,是在中国改革未完成之前,先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经济组织”,“以及其他一切事情”^{[18]416-418}。在这一判断下,根津一在 1906—1907 年酝酿了多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如联合日本各地“商工业会议所”设立“中国经济调查部”;改革会刊,及时向实业界传递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情报。不过,更被根津一寄予厚望的还是东亚同文书院的“修学旅行”计划。过去几年的经验已证明“修学旅行”是“实业诱导”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是《清国商业总览》和《中国经济全书》赢得了实业界的广泛好评。但是其规模还不够大,投入还不够多。就调查范围而言,过往调查局限在京津、沪汉等少数通商口岸地区,广大的中国内地还不曾涉足。而中国各地情况相差甚远,只了解通商口岸远远不够。因此,根津一酝酿将“修学旅行”升级为“内地大旅行”,1906 年提出一个“中国调查三年计划”(以下简称“三年计划”):即用 3 年时间,组织书院学生 300 人,对中国 18 个省实施全盘性的“详细调查”^{[18]415}。很明显,“大旅行”的称谓是相对于之前通商口岸地区的“修学旅行”(也被日本学者称为“小旅行”)而言^{[19]145},体现出调查活动的规模和用意更上一阶。

为兜售上述计划,根津一到处撰写文章、发表演说^[20]。其间虽得到日本实业界的响应,但经费投入为数甚巨,实业界的支持只是杯水车薪,故迟迟未能实施。不过,1907 年因日本政府的支持,事情迎来了转机。

二、《中国调查三年计划案》与“大旅行”的开端

东亚同文会成立以来,外务省一直是东亚同文会的最大“金主”。来自该省的“补助金”长期占会内常年经费的 6 成以上^{[3]30}。“三年计划”提出之际,根津一自然不会忘记向外务省争取资助。1906 年 12 月,他先在会员大会上抛出该计划的概要,获得会员的广泛赞成。时隔不久,又将该计划拟成书面的《中国调查三年计划案》(以下简称“三年计划案”),以全会名义提交外务省^[21]。这一文件确立了“内地大旅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可谓该调查活动开端三年的蓝图。

“三年计划案”包括绪言和正文两部分。绪言首先回顾过去 7 年书院实施“现地调查”的历史,以表明该活动由来已久,成绩突出。紧接着,抛出其用意:希望将前面几年的调查活动进行升级。主要设想有二:一是将调查区域从以往的通商口岸地区扩大到中国“内地”;二是投入更多人手,进行更为“详密”的调查。由此可知,未来 3 年的调查活动是之前“修学旅行”调查的扩大版,其根本目的自然一脉相承,即诱导日本实业界对华扩张。但这里因向日本政府争取资金支持,策划者突出了调查活动的多用途,宣称要实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商务、工业等百般事物”的“精细了解”。这一做法既有“变通”成分,也符合根津一的本意。荒尾精当年提出“商权竞争”之际,强调“商战”“兵战”并重,即当务之急是振兴中日贸易,但着眼未来,须在商业活动中穿插政治、军事类的情报活动。故“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办学以培养亟须的贸易人才为主,但同时“有一股军事的色彩”^[22]。到东亚同文书院办学时,根津一以商务科为主体(每届 60 人左右),但也设置了“政治科”,每年招生少量学生(约 10 人)。1902—1906 年书院“修学旅行”主要由“商务科”担当,但“政治科”学生同样参与其中^{[11]47-48}。因此,准确来说,东亚同文书院的“修学旅行”虽突出“实业诱导”用意,但它的调查动机是多样化的。“三年计划案”延续了这一传统。报告用完意后,绪言转入调查方法问题。其要点有三:一是将调查区域圈定为“北满洲、蒙古、新疆、甘肃、云南、贵州等边陆地区外的中国全境”。二是将调查活动分成“旅行调查”和“驻在调查”两大类,前者沿 4 条纵线和 4 条横线展开,后者在 66 个重要城市实施。三是说明调查人员和调查时间。预计 3

年内投入300人,累计调查时间18000天。为此,绪言最后提出3万元的经费申请,强调这是以“至廉”之费用成“至难”之大业。

正文由两个清单组成,它是对调查方法的进一步说明。第一个清单是调查路线,即绪言中提到的四纵线、四横线 and 66处“名都要津”。其中,四纵、四横八条线路,是沿中国大江、大河(长江、黄河、大运河、赣江、湘江等)和铁路线(京汉铁路及在建津浦铁路、粤汉铁路等)展开,如“四纵”的第一条线路是以长春为起点,沿辽河而下,出营口;沿直隶海岸到天津,顺着大运河纵贯山东、江苏,到达杭州;再沿浙江海岸到达福建、广东。“四横”的第二条线路是以上海为起点,沿长江溯江,经过南京、九江、汉口、宜昌等各埠,到达重庆。这些路线覆盖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大通道。66个城市分为两类。其一由“政治科”学生实施“驻在调查”,共有五个:北京、奉天、南京、武昌、广州。它们是全国或区域性的政治中心。其二由“商务科”学生实施“驻在调查”,共有营口、天津等61处。它们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东北地区,二是长江沿岸。前者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主要目标地区,后者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日本对华投资的重点区域。这些线路和城市的选定明显经过深思熟虑,从它们在中日贸易中的地位来看,该清单与东亚同文书院要培养中日贸易人才的主要办学目的相合;从特意安排“政治科”调查城市来看,策划者不完全从“贸易”角度考虑问题,政治、军事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这与绪言中要调查“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商务、工业等百般事物”相呼应。第二个清单分年开列调查任务。比如,第一年的“旅行调查”拟安排四纵线中的“大运河线”等6条线路;“驻在调查”则安排汉口、天津等7个城市。第二年安排另外6条线路和另外11个城市(下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路线和城市在策划者心目中的轻重缓急。

对于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对华调查活动,外务省一直比较满意。1905年,为调查俄国势力对中国北方的渗透,该省曾委托根津一挑选书院学生5人,前往新疆、蒙古等地进行内地调查。这5人很好地完成了调查任务,外务省奖励书院一笔丰厚的“奖学金”^[23]。基于这样的经历,外务省对于同样是针对中国内地的“三年计划案”十分认可。另外,参谋本部负责对华情报的福岛安正也积极出面促成^{[19]145}。于是,该案递上之后,外务省很快批准了3万元的补助金。从1907年7月开始,“内地大旅行”正式实施。

其后,每年“大旅行”实施之前,东亚同文会都会制定当年的调查计划。根据书院学生的回忆,这类计划一般是出自根岸佶之手——每年的3月,根岸佶都会从东京本部来到书院,和书院师生一同“商量”当年大旅行的主要安排^[24]。其间形成的“预定调查计划”会在5月左右提交外务省^[25]。这种预定计划一般包括3个部分:调查路线、调查题目及人员配置、经费预算。从1907年的实例来看,每年的预定计划贯彻了“三年计划案”中的主要用意和基本方法。比如,调查活动分为“旅行调查”和“驻在调查”两个大类。前者基本上按四纵、四横的设想展开,当年的“京汉铁道线”“浙赣湖广”线分别是“四纵”和“四横”的一部分,后者都是从66个城市清单中选定。又如,经费预算比照3年3万元的经费额度,每年预算总额为1万元。从这些方面看,尽管每年调查计划的出台存在“商量”的因素,但明显是比照预先确定的“三年计划”展开,书院师生所能“自主”的空间是非常小的,无非是选择参加哪一条路线以及某一段行程预算几何等无关大局者。换言之,“大旅行调查”虽然名义上由东亚同文书院师生实施,但主要安排却出于其母体东亚同文会之手。

另一方面,每年的“预定”计划相对于“三年计划”也有调整之处,尤其是调查路线和调查地点。如,“三年计划案”开列的第三年(即1909年)“驻在调查”城市共11个,但当年的预定计划只安排了4个^[26]。这种差异反映出东亚同文会参考时势因素,对调查任务做出灵活调整。

每年的“预定计划”中,有一类内容值得特别注意,即调查题目和人员配置。这是“三年计划

案”中没有的内容。从1907年的实例来看,调查题目分成“旅行调查”和“驻在调查”两大类。“旅行调查”题目共有四类:1.地理(其下有山河形势,气候地味,人口、都邑和风俗,生产事业,交通运输与税关等5个小类);2.经济(其下有田圃及宅地、资本家事情、劳动者事情、物价、人民生活程度、财政、外国人企业及势力等7小类);3.商业(其下有贸易大势、重要商品、商业惯例、商贾及组合、度量衡及金融等5个小类);4.政治(其下有行政、军政、司法、教育、宗教5类)。“驻在调查”中,“商务科”驻在城市的调查题目有三类:1.地理、经济;2.贸易;3.商业机关。“政治科”驻在城市的调查题目有四类:1.官制;2.军政、教育、司法及警察;3.商部及外交部;4.财政^[25]。这意味着,实施“旅行调查”的各调查班虽然调查线路不同,但调查题目是统一的。同理,在不同城市实施“驻在调查”的各“商务科”调查班题目也是统一的,“政治科”调查班亦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同“旅行调查”班的调查报告,其内容从一级标题到二级、三级标题都高度相似,其原因正在此。其二,调查题目与人员配置高度对应。如“旅行调查”的人员安排都是“3×2+1”模式。即“地理”“经济”“商业”三类题目各安排2名“商务科”学生,累计6人。“政治”大类则安排1名“政治科”学生,于是有每个调查班7人的常见配置。“驻在调查”的人员安排与此相近,不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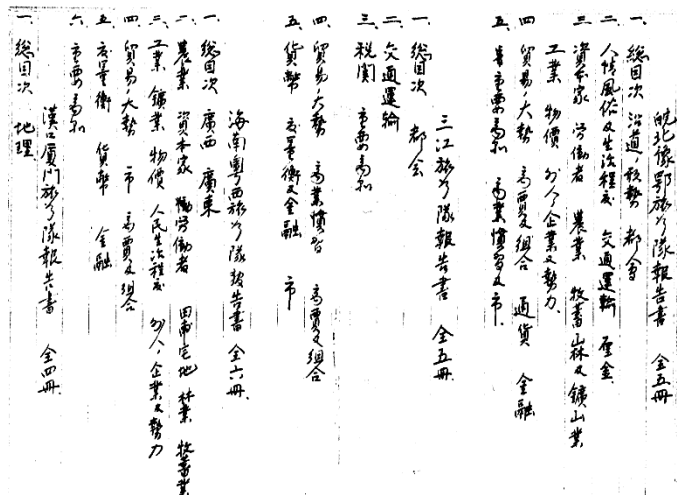
每年的预定计划是当年“大旅行”的指导性文书,但它无法得到完全落实。从书院学生事后提交的“日志”和“报告书”来看,实际的调查路线、人员配置以及支出情况,都会与预定计划有出入。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每年的预定计划提交后,外务省可能会做一定调整。其二是东亚同文会结合招生、伤病以及时局等因素,主动做出调整。比如,1907年的预定计划中,调查人数是101人。但实际只有86人,“政治科”仅11人^[27]。调查人手不足,必然使计划中的调查线路无法完全落实,并且会影响到调查题目的落实。如“政治科”人手严重短缺,当年“淮卫河线”“山东铁道线”“闽浙广东线”三条线路均未安排此类学生。这些线路的“政治类”题目也就无从调查。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同调查班的“调查报告”中,有些有“政治”类内容,有些则没有,原因正在于此^[28-29]。

既然存在上述出入,那么三年下来,“大旅行”的完成情况与“三年计划”中的设想就有一定偏差。其一表现在调查区域,“三年计划”原本将“北满”“蒙古”“贵州”等“边陆”地区排除在外,但实际的调查活动已覆盖到这三个地区^[30]。其二表现在调查路线和调查地点,当初确定的66个“驻在调查”城市,只落实了7个。其三表现在调查题目,有些调查路线实施了全部四个大类的调查,有些路线则未能实施“政治”大类的调查。很明显,不同地区的调查程度不尽相同,这与“三年计划”要全面掌握中国内地“政治、经济、教育、商务、工业等百般事物”的野心不一致。

但总体看,第一个周期的调查活动还是很好完成了“三年计划”的主要目标。从调查路线看,“三年计划”提出的四纵、四横两大“一等路线”,1909年已经基本调查完成(详见下节)。从调查内容看,1907年预订计划确定的“调查纲目”,与1908—1909年各调查班实际提交的调查报告书纲目高度吻合^[28-29]。这表明,这三年的调查题目一直是稳定的。并且,同一年内,各“旅行调查班”的报告书纲目都十分相似(参见图1),这反映出各调查班都落实了统一的调查题目。报告书纲目中,经济、商业类内容最多见,同时也有“政治科报告”,这说明以“实业诱导”为主并兼顾政治、军事需要的目的得到了实现。

根津一本人对“三年调查”结果十分满意。在1909年12月东亚同文会会员大会上,他宣称:三年的“大旅行调查”已经“顺利完成”,“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对中国最重要的地区实行了全面的精密调查”^[31]。1911年初,东亚同文会向外务省提交《中国实地旅行调查要旨》,文中总结1907—1909年的调查活动时指出:每回“旅行调查”的报告书都在15000页内外,而花费只需要1万元。若由外务省实施同样的调查,每回花费15万元不止。另外,调查活动以“修学旅行”名义实施,始

终没有引起中国官、民的警觉,还得到了他们的“几多便利”^①。调查材料充实,“经济事情尤其详密”,它们平时可用于编辑地理书籍或经理学校(日本的一种军校,负责培养军事财务、给养等“主计科”人才)教材,到“事变场合”更可以发挥“最重要价值”。调查活动还培养了深入中国内地的“实历者”,他们对“国策前途”有重要价值^[32]。这些总结再次印证“大旅行调查”以对华扩张为根本目的。



资料来源:「5 第叁期旅行調査報告書總目録」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449200、東亜同文会ノ清国内地調査一件(1-6-1-3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图 1 1909 年(第 3 期)各调查班“大旅行调查”报告书(部分)

对上述“成绩”,日本官方表示了认可。1910 年,外务省评价过往三年的调查对于“了解中国实情具有显著的功能”,决定拨出“特别预算”,对新周期的“大旅行调查”继续资助^{[11]49}。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认为该调查有益于邦国,当年从本部拨付 3 500 元补助金,还劝说农工商省补助 1 000 元^[33]。这些都大大鼓励了东亚同文会下一步调查的野心。

三、从一等路线到二等路线:第二个“三年计划”的谋划与实施

1910 年暑期开始,“内地大旅行调查”进入第二个“三年计划”。该“三年计划”与第一个“三年计划”的关系,在当年 6 月东亚同文会提交给外务省的《东亚同文会事业一览表》中有如下表述:

过去的三年间,对十八省中重要都府、商业地及交通线路的调查计划,在明治四十年(注:1907 年)后依次实施,截至四十三年(注:1910 年)取得了预计中的良好效果。现在,第二个三年计划确定,对十八省中之前未到的地点进行调查。打算今年(注:1910 年)七月着手实行。^[34]

在同年 5 月的会员大会中,根津一就第二个“三年计划”也有报告。略谓:

刚刚获得与去年一样的财源,从今年开始,另一个三年内的“实地调查”开始实施。之前的调查,是针对一等重要的地点和一等重要的线路。现在,要进一步调查二等地点和二等线路。^[35]

这两种材料都提示:新“三年计划”是沿用第一个“三年计划”的调查思路和方法,在空间上做

① 按,根津一的这一判断总体上符合实情。从这一时期的“大旅行”日记来看,各调查班的调查活动都是在当地中国官民的帮助下实施的。不过,也有部分中国人对“大旅行”有所警觉。比如 1907 年 10 月,申报在报道“日人经营蒙古之计划时”,指出上海同文书院派学生“实地调查中国国情”等活动也有对华扩张意图,“其野心亦可见矣”(参见《申报》,1907 年 10 月,第 11 版)。但在当时“以日为师”的背景下,这类声音没有成为社会共识。这是该时期“大旅行”调查计划能够得逞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一步拓展,从“一等地点”到“二等地点”,从“一等线路”到“二等线路”。随后3年,东亚同文会像过去一样,每年提交“大旅行调查”的预订计划。从这些文书中,可进一步看到新、旧“三年计划”的承接:如1911年提交的《第五回大旅行预算案》《第五回大旅行调查案》以及《调查事项》^[32],从“第五回”的称谓可知本年的“大旅行”是承接1907年开始的“内地大旅行”,性质不变。从“预算案”中能看到本年的预算表格与1907—1909年的几乎完全一致,可知预算方法沿用成例。更重要的是调查题目,《调查事项》中所列出的1911年商务科学学生的调查题目,一共三大类:“地理”“经济”“贸易”。地理大类下面是沿途形势、气候、都会、人情风俗等。经济大类下面是经济单位、资本家、劳动者等。这些都与1907—1909年的调查题目雷同,这表明新“三年计划”沿用了之前的调查题目,相应也承袭了之前的调查动机。

同时,新三年计划也有“升级”的一面。其一即调查范围的扩大。新“三年计划”调查的是与第一个三年不同的“二等线路”和“二等地点”,这意味着调查活动会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下沉到中国社会的更底部。从实际的调查线路看,1910—1913年“内地大旅行调查”共安排29条“旅行调查”路线、4个“驻在调查”城市。它们与第一个三年周期的调查线路和城市基本上没有重复。其中,有几个新覆盖的调查区域引人注目,一是“北满”(1910年调查)、二是云南(1910年调查)、三是甘肃(1910年、1913年两次调查)^{[3]231}。在这个调查周期完成后,“大旅行”调查足迹已覆盖中国所有行省地区。其二是调查题目的细密化。在1907—1909年提交的“实施案”中,调查纲目下分到二级标题,比如第一大类“地理”下面,只有“沿途形势”“气候”等第二级分类^[25]。但1911年提交的《调查事项》中,调查纲目下分到了第三级标题,比如第二级“沿途形势”下又细分“甲,沿途概况”“乙,山岳”“丙,河流和湖泊”等^[32]。调查题目细化,意味着调查活动会更为精密和规范。第三,调查活动的政治用意上升。1908年后,“清末新政”进入“宪政改革”阶段,中国时局动荡,革命征兆日益明显。在1910年12月的东亚同文会会员大会上,根津一预言:中国实行“宪政”后,政争将加剧,可能发生“局部内乱”,甚至是“一场难以收拾的大内乱”,“万一上述情况真的发生,那么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利益攸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作为邻国,为了中国,也为了自卫,不能袖手旁观”^[36]。这表明,东亚同文会已预判到中国革命山雨欲来,并企图加以利用。在这一背景下,新“三年计划”强化了政治类的调查任务。第一个三年周期中,“政治科”学生的调查纲目只有行政、军政、教育、司法、宗教五个大类,略显粗糙^[25]。但1911年调查纲目中有12个大类,前7个大类下又分为若干小类。略谓:

- 一、立宪预备事情(甲,一般预备事情;乙,资政院;丙,咨议局);
- 二、官制(甲,外官制;乙,出使人员)
- 三、任用(甲,外转;乙,选补;丙,调用;丁,保举;戊,举贡生员出路等)
- 四、外交(甲,通商条约;乙,条约;丙,合同)
- 五、民政(甲,考核;乙,工程;丙,巡警;丁,禁烟)
- 六、财政(甲,赋税;乙,盐课;丙,土药膏;丁,印花税;戊,贷款等)
- 七、教育(甲,学生;乙,外国留学)
- 八、军政
- 九、司法
- 十、实业
- 十一、交通
- 十二、地方行政。^[32]

这些调查内容,使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政局的变化保持着敏锐嗅觉,随时谋划着下一步的对华

经营。

新“三年计划”实施期间,发生了日本吞并韩国一事(时在 1910 年),中国朝野对日本的侵略手法和扩张阴谋提高了警觉^[37]。紧接着,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局势动荡不安。个别调查班的活动受到一些影响^[38],但总体上仍顺利完成。1910 年至 1912 年 3 年的调查报告书都在 1.5 万页左右,与往年持平^{[39]505}。报告书内容体例也与之之前基本一致。不过,革命期间东亚同文会的对华野心膨胀,提出过多个带有“国策”性质的对华经营方案,这对下一周期“大旅行调查”的谋划大有影响。

先是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一时间,该会便炮制一个重要计划:派若干“通信员”前往中国,“与革命党的首领人物交往,或与商会会长及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交往,努力维持中日贸易,或与各议会的主要议员以及其他地方有影响力的人物交往,为将来打好基础”。一旦时机成熟,便“团结扬子江以南各省,形成一个稳固的共和国,然后进一步努力向北发展”^[40]。其目的除了谋求根津一一贯重视的经济扩张外,也为政治利益扩张做准备,企图建立一个亲日的新政权。但当时日本政府追随列强宣布“中立”,并未采纳这一计划。1912 年 2 月,清帝退位,中国确立共和体制。根津一预测,此后中国的局势演变喜忧参半。假如中国政局能安定下来,它将会有 8 个方面的积极变化:财政扩张、政务振兴、币制改革、金融整顿、交通改进、农工商业发展,教育和体育改革、满汉融合。这些对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都是大好机遇。但是革命也给中国带来八大难题:伦理道德的混乱、党派之间的冲突、女性地位过高、书生言论过激、军人横行霸道、裁军的负面影响、贿赂与贪污、秘密结社等。局势能否安定下来,尚不可知^{[41]505}。即使中国持续动荡下去,日本同样有机可乘,对华经济经营“仍然应该采取发展主义”。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哪怕是战争时期,贸易额也未必会下降(这次革命期间中日贸易额反而增加),并且日本实业家在华的利益,有军队提供保护^[42]。总之,无论中国局势往哪种方向演变,日本都要做好对华扩张的准备。为此,根津一在当年 5 月的会员大会上提出另一个对华谋略:《对中国经营助成案》。该案共 14 条建议,大多与中日贸易有关(详后),体现了根津一对中国革命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契机的预判。“大旅行调查”作为“贸易诱导”的重要手段,在该案中有 3 条相关建议。该计划提交外务省后,得到西园寺内阁的支持,眼看就要纳入预算,但年底“大正事变”发生,内阁更迭,遂“不了了之”^{[43]525}。

两大计划接连落空,让东亚同文会高层十分痛心。他们将原因之一归结为日本政府和民众不了解中国国情。根岸佶为 1912 年的“大旅行志”作序时,痛斥中国革命爆发以来,日本朝野对中国的认识“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民间的意见四分五裂、政府的方针朝令夕改”“在乱事结束前,没有任何作为”^[44]。挽救的办法是努力向日本社会普及中国国情。为此,东亚同文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从 1912 年起,会刊改为公开发行^{[41] 498-499}。当年 11 月,派出根津一、大原武庆等到日本各地讲演,企图“统一”国民的对华认识^{[3]194}。在这一背景下,肩负着调查中国国情重任的“内地大旅行”更被寄予厚望。当年恰值第二个“三年计划”(1910—1912)结束,下一个周期的计划因“助成案”未获得政府预算而流产。于是,1913 年东亚同文会自筹“临时经费”,实施了第 7 次“大旅行调查”。这次调查的计划要点见于根津一当年 5 月的会员大会报告^{[39]506},实际调查路线和调查内容等见于本期学生的“大旅行志”^[45]。他们都与之前的同类资料要点相近,可知本次调查沿用了过往三年的惯例。

总之,由于革命爆发,第二个“三年计划”以及 1913 年“大旅行”的实施稍有曲折。但革命期间,东亚同文会对华方针延续并强化了“经济扩张”意图,这让“大旅行调查”保持着基本盘的稳定,4 年间的线路设计、人员配置、经费预算方法以及“商务科”调查题目,都与之之前大同小异。同期,东亚同文会对华政治野心膨胀,这带来了“政治科”调查题目的变化。革命过后,该会进一步

抛弃不干预政治的立会宗旨,更主动地充当日本对华扩张的马前卒,对“大旅行”的重视程度随之上升。下一周期的调查计划虽因“助成案”未获政府预算而一时流产,但该会“不屈不挠”,“继续向各个内阁采用各种方法进行交涉和运动”^{[43]525}。时隔不久,转机就到来了。

四、《对中国经营助成案》背景下的第三个“三年计划”

1914年5月,经过东亚同文会高层的长期“斡旋”,大隈重信内阁同意就《对中国经营助成案》提供15万元经费。在正式“命令书”签署前夕,该会将“助成案”定稿及相关文书提交外务省。相比1912年5月会员大会上提出的“助成案”,定稿“助成案”的内容大为扩充:原先的14条建议增加为15条(新增条目是关于东京中国留学生的“诱导”),每条建议后都附加了详细的说明性文字。其中,与“大旅行调查”关系最密切者,有三处文字。

其一是“助成案”正文前的“主旨”。它揭示了包括“大旅行调查”在内15条建议的动机。略谓:

满朝灭亡,共和国建立。此新立之国,诸事呈现生气。但是该国渐渐多事,政党纷争,社会混乱,其前途将入难境(下略)。

我国对华经营施設,可分为平、变两样。平时主要是经济经营,极速地扶植利权,努力发展我国势力(下略)。变时之际,假如有机可乘,则采取进一步措施。^[46]

这里,“平时”的用意与之前根津一宣扬的对华方针相同,即发展日本对华“经济经营”。“变时”的用意表述得较为隐晦。不过,在同年根津一提交日本当局的其他“时局意见书”中有更清楚的表露。如当年他就青岛问题投书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提出对华的思路“第一是收揽中国人心,第二是发展(对华)经济”。在此基础上“仿照日本的朝鲜政策步骤”,让中国变成日本的“半保护国”“保护国”,最后“合并”^[47]。可见,根津一所谓“变时”的“进一步措施”,就是逐步吞并中国,用心极其狠毒。

其二是15条建议中的《中国内地实地调查案》,这是专门针对“大旅行调查”而提出的谋划。该案指出:“对中国经营发展的最急务”是继续实施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旅行”。争取10年后对中国全国的“小都市”悉数调查完毕。如能达到这一目的,将来“变时的场合”能发挥“更重要的价值”^[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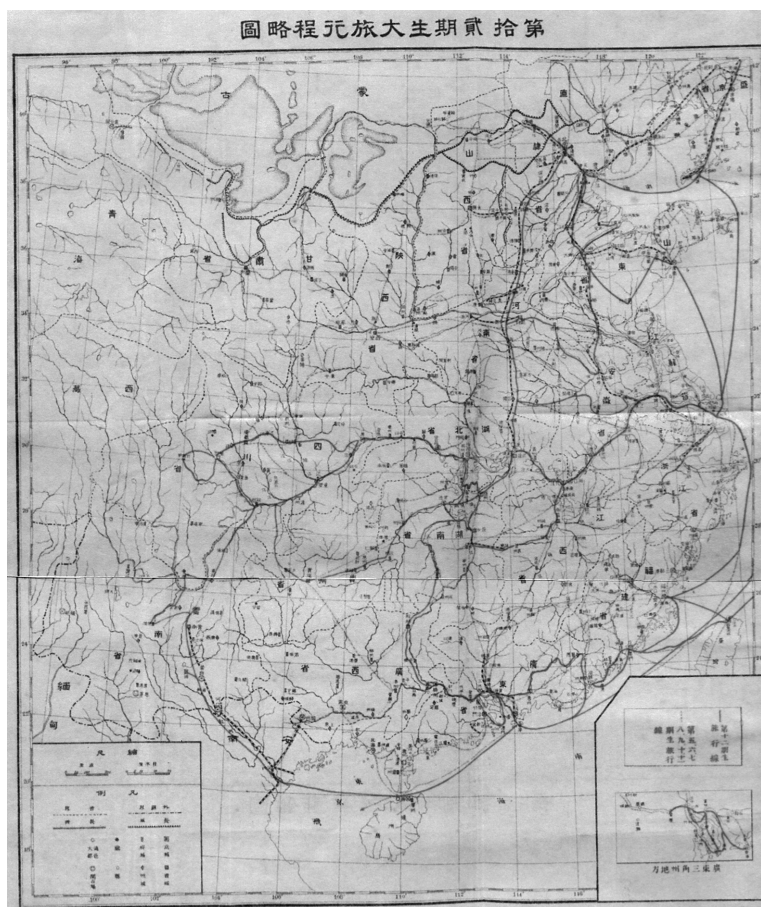
这一则建议后附了一个“调查纲目”,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商务科”调查题目与1911年调查纲目高度相似。比如,一级标题仍是三个大类:“地理”“经济”“商业”。“地理”下面的二级标题仍是“沿途形势”“气候”“都会”等。“沿途形势”下的三级标题仍是“沿途概说”“山岳”“河流”等^[49]。其次,“政治科”调查题目发生了显著变化。1911年的调查纲目是12个宽泛的专题(预备立宪、官制等),而“助成案”中的调查纲目是20多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在原文中分成两大类,一是政局的现状,即中国各地正在发生的时局变动,包括:文武和乡绅之间的内讧、军人的跋扈、裁军的始末、财政的困境、对共和政体的民心意向、对日本人及外国人的态度等。二是既往政治问题的实情,比如预备立宪的举办成绩、民众对咨议局的感情、新审判制度实施状况、征兵实施地方的状况等。前者是上文中提到的根津一推测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社会的难题,也是最可能导致政局动荡的变数。后者是清末新政以来中国政治、法律、军事等改革措施的实效,也是中国社会在革命后可能出现的新变化。两相比较,“政治科”新题目不只更细密,而且更对准中国时局的难点。这显然与预备“变时”的用意相吻合。

第三处文字,是15条建议中的《特种学生养成案》。其内容略谓: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商务科”“政治科”之外,新增“农工科”。该科学生学习“农产制造学”“工业化学”等课程,在中国“内地旅行中”可以收集各种原料、标本,带回到书院附属“试验所”试验研究,试验结果向东亚同文会本

部报告。本部依据“适当方法”向日本社会介绍,将日本实业家诱入“清国富源开发”^[50]。显而易见,该计划旨在进一步贯彻“实业诱导”方针,让“大旅行调查”更好服务于对华经济扩张。

《对中国经营助成案》提交后,日本内阁只采纳了其中的少许建议。不过,与“大旅行”相关的 3 条建议被悉数采纳。5 月 4 日外务省签署“命令书”,对“大旅行”及调查资料的出版,每年拨款 2 万元,为期 3 年;对增设“农工科”拨款 7 万元^[51]。在获得这笔资助后,“大旅行调查”进入第三个“三年计划”周期。该时期出现了“二十一条”交涉,引起全国性的反日爱国运动。另外,进入民国后,中国官民的国家观念增强。因此,国人对于“大旅行”的警惕性有所提高,对其中危害中国主权的行为有所抵制。比如,1914 年“大旅行”学生秘密测绘射洪县的盐井和隘口,四川当局即向日本驻重庆领事提出交涉^[52]。但由于北洋政府的软弱,这类问题一般不了了之。三年下来,“大旅行”仍按预定计划完成。并且,由于调查经费翻倍、调查人手增加(新增农工科学生)、调查手段升级,其实施效果比前两个“三年计划”更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调查范围完成了从“点、线”到“面”的升级。“大旅行调查”从一开始就企图调查中国全境,因此非常注意调查线路的更新和拓展。前两个三年周期基本完成“一等线路”“一等地点”和“二等线路”“二等地点”的调查。下一步的目标是调查完中国的所有城市。故第三个三年周期的调查路线主要针对之前尚未调查的地区(参见图 2)。在这个周期结束后,“大旅行”已经覆盖到对华“实业诱导”价值不大的偏远小城市。如果将此时已经调查过的所有线路和地点一一在地图上标出,除西藏、新疆、青海等少数地区,其他地方都是一种密密麻麻的状态(参见图 2),远看就是一个“面”。正如民国时期王古鲁所言:中国人面对这样的路线图,“谁人不惊心怵目呢”?^[53]⁸⁶



资料来源:東亞同文書院編「同舟渡江:第十二期生」(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誌 8)、愛知大学 2006 オンデマンド版、正文后插图。

说明:图中实线是 1914 年调查路线,虚线是 1907—1913 年调查路线,能看出二者基本上不重合。

图 2 1914 年(第 12 期生)“大旅行”调查路线

其次,调查资料丰富多样,更便于日本对华扩张。《对中国经营助成案》提出的“农工科”从1914年开始创办,虽然首届学生只有8人^[54],但其作用不可小视。1915年开始,“内地大旅行”为他们专门设计调查线路,比如1916年的“农工科湖南线”。这些学生受过农学、化学、采矿冶金方面的专门训练,搜集的调查资料与“商务科”“政治科”不同。后者收集的主要是文字、照片、拓片等文献类资料,但农工科学学生除收集这类资料外,还大量收集各地的农业、工业标本等实物。因此,自从“农工科”设立以来,“大旅行”调查资料大为丰富。据1922年东亚同文书院制作的一个标本目录,仅云贵川地区,各调查班已收集的标本就有米麦、豆类、药类、胡麻类、花生类、烟草类、麻类、棉类、茶类、燃料类、药材类(工业加工药材)等11个种类,合计140多种^[55]。根据《对中国经营助成案》中的计划,这些标本会在书院做进一步的分析化验,其结果由东亚同文会本部向国内介绍。这会让日本实业家在华扩张时有更精准的目标,也方便日本与欧美国家争夺在华利益。

按照1914年“助成案”中的谋划,“大旅行”要继续实施10年,直至调查完中国所有城市。但是在1914—1916年的三年周期完成后,该设想遭遇了很大阻力。首先,“大旅行”连续实施10年后,已基本覆盖了所有中国重要城市和重要线路。再继续调查下去,只有“求全”的意义而产生不了多少新意。书院内部一些教师不赞成按以往的方法继续调查,主张对“大旅行调查”进行改革^{[2]59}。其次,外务省对第三周期的调查效果不太认可。1918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曾致函外务省,批评东亚同文书院的办学状况。称该书院学制三年,但第三年大部分时间用于“调查旅行”,真正的学习时间只有两年。学生的学识以及他们的调查报告都难免“粗浅”。“像现在这样肤浅草率的调查报告,对于专业的经济措施几乎没有实际益处,而且白白浪费学生的时间和精力。”^[56]这些意见,都迫使“大旅行调查”要做出改变。因此,东亚同文会不再坚持“助成案”中的10年计划。1917年起,该会着手将1907—1916年的调查报告进行系统整理,编辑出版《中国省别全志》^[57]。这是对前10年“大旅行调查”的一个总结,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中国省别全志》编纂期间,在马场敏太郎(书院第5期生,第一回“大旅行”参加者)等教师推动下,东亚同文书院设立“研究部”,事业之一即指导学生开展“大旅行调查”^{[53]87}。新策划班子舍弃之前对中国实施通盘性调查的思路,从“求全”走向“求专”,走“研究型”路线。同时也修正了根津一为贯彻“实业诱导”方针而以经济为本位的做法,要求学生注意经济背后的文化因素,指导学生多看名胜古迹,多了解中国文化史^{[2]59}。相应地,在调查题目上,各调查班不再是带着统一的题目去调查不同地域,调查路线也不再是承接上一阶段而不断拓展。取而代之的是为不同调查班设计不同的调查题目以及相应的线路。如1919年的“北支内蒙古羊毛班”“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棉花班”“中北支金融事情班”,1920年的“南方移民班”“饥谨调查班”等^{[3]232}。总之,1917年后“内地大旅行调查”在思路和方法上都发生了显著转型,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代。

五、结 语

对于“大旅行调查”,以往研究大多从东亚同文书院的视野下加以考察。但是,从1907—1916年的历史来看,该活动只是由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实施,其策划则出自东亚同文会高层之手。每个阶段、每一年的调查活动事先都有着周密的谋划。其中除了高层人物的意志,也存在外务省和参谋本部的影子。因此,“大旅行”性质如何,不能主要看书院学生的活动和言论,更应该看高层的幕后策划。

首先,“大旅行”开端之际,主要策划者根津一承袭了荒尾精“商权竞争”的口号,以对华“实业诱导”为主要用意。之后,虽然局势不断变化,但根津一在会内地位长期不变,该调查用意也长期

不变。这从1907年“三年计划案”、1912年《对中国经营助成案》出台的背景以及1914年“助成案”的“主旨”中能反映出来。调查动机的稳定带来了十年间调查方法的稳定。其间,“大旅行”分为三个三年周期实施,但各周期的调查内容、人员配置、经费预算等大同小异。尤其是“商务科”学生作为调查主体,其调查题目在各周期十分相似。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同年份、不同路线的调查报告书,其纲目往往十分接近。据这些调查报告书整理而成的《中国省别全志》,各卷(即各省)的体例也十分接近。调查思路的稳定,也让各周期的调查路线前后相继,层层推进。

其次,“大旅行”虽始终突出“实业诱导”的主要用意,但它一开始就是多用途的。1907年的“三年计划案”中就贯彻了政治、军事用意。1910年后,随着清末“立宪”以及革命运动发生,调查活动的政治用意显著上升。故相对于“商务科”调查题目的稳定,“政治科”调查题目在不同周期变化很大。其趋势是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强化“变时”的需要。从这一点能清楚看到,在薄井与翟新之间,后者揭示的“大旅行”调查动机更接近实情,即该调查的策划从根本上服务于日本对华扩张,其性质是罪恶的。

冯天瑜先生曾指出:近代以来“日本对华商战和军事侵略屡屡得手”,与东亚同文书院、满铁等机构“提供系统的、巨细无遗的中国调查颇有关系”。反之,中国对本国国情和日本的了解则“大而化之,粗疏凌乱”。这种不对称情况,造成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反侵略斗争中处处被动,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教训”^[58]。以史为鉴,今天对“大旅行”这样的调查活动,首先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其次更需要加强实证性研究,以深入揭示日方的调查动机、方法及其与侵华决策之间的关联。

参考文献:

- [1] 藤田佳久. 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考察旅行与书院生描绘的中国形象[J]. 季刊地理学, 1998, 50: 273-286.
- [2] 薄井由.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236.
- [3] 翟新. 东亚同文会与中国: 近代日本的对外理念及其实践[M]. 东京: 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2001: 220-224.
- [4] 翟新. 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98.
- [5] 周建波, 陈皓. 东亚同文书院研究评述及其展望[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21(4): 37-49.
- [6] 张艳国, 石嘉. 近代日本在华调查机构的“江西调查”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19(11): 112-120.
- [7] 曲晓燕, 李云泉.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调查[J]. 暨南史学, 2020(1): 154-168.
- [8] 黄福庆. 甲午战前日本在华的谍报机构——论汉口乐善堂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J].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84(13): 305-331.
- [9] 佐藤正. 南京同文书院设立意见书[M]//近卫笃磨日记刊行会. 近卫笃磨日记: 卷2. 东京: 鹿岛研究所出版会, 1968: 489-490.
- [10]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00年. 南京同文书院章程、南京同文书院职员及担任课目(B12081968300)[A]. 2025年1月5日,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11] 滬友会.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M]. 东京: 沪友会, 1955.
- [12] 东亚同文书院第三年生的修学旅行(1903年10月)[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 霞山会, 1988: 390-391.
- [13] 东亚同文会明治三十六年秋季会员大会[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 霞山会, 1988: 364.
- [14] 东亚同文会明治三十七年春季会员大会[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 霞山会, 1988: 384.
- [15] 东京同文会明治三十七年秋季会员大会[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 霞山会, 1988: 390-391.
- [16] 东亚同文书院第三期生的毕业典礼记事 根津院长的祝辞[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 霞山会, 1988: 413.
- [17] 翟新. 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99.
- [18] 东亚同文会明治三十九年秋季会员大会 根津一氏的报告[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 霞山会, 1988.
- [19] 栗田尚弥.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架起日中桥梁的男人们[M]. 东京: 新人物往来社, 1993.
- [20] 根津一. 对中贸易与同文书院[J]. 远东闻见录, 1907(2): 62-68.
- [21]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06年. 三年计划中国调查案(B03050448900)[A]. 2025年1月5日,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22] 黄福庆. 甲午战前日本在华的谍报机构——论汉口乐善堂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J].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84(13): 305-331.
- [23] 藤田佳久. 波多野养作的中国西域调查旅行——从作为东亚同文书院实施中国调查旅行契机的实地调查旅行记录来看[J]. 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 1991(94): 1-81.

- [24]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08 年. 豫晋线调查报告书(B030505560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25]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07 年. 第一期旅行调查驻在调查实施案(B030504490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26]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09 年. 第三期予定案:清国内地大旅行调查计画案(B030504491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27]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09 年. 第一期实行案一览:清国内地大旅行调查计画案(B030504491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28]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08 年. 鄂蜀线调查报告书(B030505409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29]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08 年. 沅贵线调查报告书(B030505460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30] 东亚同文书院. 一日一信:第 7 期生[M].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志 3. 丰桥:爱知大学松雄堂,2006.
- [31] 明治四十二年东亚同文会秋季会员大会[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霞山会,1988:460.
- [32]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11 年. 第五回(B030504493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33]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09 年. 分割 5(B120819686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34] 东亚同文会事业一览表(明治四十三年六月调)[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霞山会,1988:477.
- [35] 明治四十三年东亚同文会春季大会上根津干事长的报告[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霞山会,1988:467.
- [36] 明治四十三年东亚同文会秋季会员大会[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霞山会,1988:489.
- [37] 李细珠. 日韩合并与清末宪政改革[J]. 近代史研究,2011(4):106-120.
- [38] 东亚同文会明治四十四年秋季会员大会[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霞山会,1988:497.
- [39] 东亚同文会大正二年春季会员大会[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霞山会,1988.
- [40] 翟新. 东亚同文会与中国:近代日本的对外理念及其实践[M]. 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1:190.
- [41] 东亚同文会明治四十五年春季大会[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霞山会,1988.
- [42] 根津一. 关于中国的现在以及未来的大势[N]. 福冈日日新闻,1912-11-26 至 1912-11-30.
- [43] 东亚同文会大正三年春季会员大会[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霞山会,1988.
- [44] 根岸信. 序[M]//孤帆双蹄:第九期生大旅行志. 东亚同文书院,1912:1-2.
- [45] 东亚同文书院. 沐雨栉风:第十一期生[M]. 丰桥:爱知大学松雄堂,2006:序言页、目录页及附录“旅行过程表”.
- [46]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14 年. 对中国经营补助案主旨:一般分割 3(B120819692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47] 根津院长时局意见书三编(1914—1915)[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霞山会,1988:257-261.
- [48]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14 年. 中国内地实地调查案说明:一般分割 3(B120819692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49]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14 年. 中国内地研究调查要目:一般分割 3(B120819692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50]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14 年. 特种学生养成案说明:一般分割 3(B120819692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51]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14 年. 命令书:一般分割 4(B120819693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52]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14 年. 15 大正 3 年 9 月 19 日到大正 4 年 4 月 21 日(B030504506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53] 王古鲁. 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M]. 上海:生活书店,1936:86.
- [54] 东亚同文会秋季大会各事业报告(1915 年 12 月)[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霞山会,1988:550.
- [55]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22 年. 标本目录:2 一般大正十一年十二月分割 1(B05015332600)[A]. 2025 年 1 月 5 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
- [56] 关于东亚同文经营的稟申事宜[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霞山会,1988:569.
- [57] 东亚同文会大正六年春季大会[M]//东亚文化研究所. 东亚同文会史. 东京:霞山会,1988:69.
- [58] 冯天瑜.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历史警示与当下启迪[J]. 文化软实力研究,2018(6):5-10.

责任编辑 江娟丽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